

# 史彬事迹钩沉

毛海明 张帆

**内容提要：**本文的研究对象史彬，是元朝前期政坛上一位有过短暂风光的人物。他出身于著名世侯家族真定史氏，父亲是元朝汉人中唯一官至中书右丞相高位的勋臣史天泽，本人在40岁前后就担任了御史中丞、中书左丞这样的朝廷要职，但却由于与“敛财”之臣卢世荣合作受到牵连，因惊惧忧郁而早逝。史彬不仅《元史》无传，在现存文献中也没有留下任何相关的碑铭、赠序、题记之类传记资料，致使学术界以往对此人几乎一无所知。本文钩稽零散材料，对史彬的生平事迹进行了初步考证，也间接讨论了元世祖至元中期朝廷政治斗争的若干细节问题。

**关键词：**史彬 卢世荣 史天泽 阿合马

对古代有一定身份和地位的人来说，“没世而名不称焉”<sup>①</sup>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本文研究对象史彬就遭遇了这样的尴尬。尽管他出生于蒙元著名汉人世侯家族真定史氏，其父是“出入将相近五十年”<sup>②</sup>的勋臣史天泽，并且他本人在40岁前后就担任了御史中丞、中书左丞这样的高级重要职务（这对元朝普通汉人来说难以想象的），但史书和研究者竟然严重地忽视了他的存在，致使我们以往对此人几乎一无所知。<sup>③</sup>本文打算钩稽史料，对史彬的生平事迹进行简略考证，使大家重新了解这位被遗忘的历史人物，同时也对元朝前期政治史增添一些新的认识。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 一 史彬其人

真定史氏发迹于蒙金战争期间，其地位在第二代成员史天泽（1202—1275）时

① 语出《论语·卫灵公》。见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173页。

② [元]王恽：《开府仪同三司中书左丞相忠武史公家传》（以下简称《史天泽家传》），《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四八，《四部丛刊》本。

③ 最近有的民间研究者开始从宗族历史的角度关注史彬其人。例如史英豪《元朝中书左丞史彬年考》，史氏春秋网 <http://www.sscqw.org/Article/zhuanti/201112/1107.html>。但受掌握资料所限，其了解程度还远不够精确和详细。

达到顶峰。从大蒙古国到元朝前期，史天泽“历事四朝，恩遇眷倚始终不少衰，复能敛百战之威，雍容廊庙，以道事君，为时贤相”<sup>①</sup>，成为元朝唯一仕至中书右丞相高位的汉人。卒赠太尉，谥忠武，后累赠太师，加封镇阳王。天泽在世时，其子侄已经纷纷入仕，“布列中外”<sup>②</sup>，虽因声势过盛曾经遭遇一些压制，但史氏的总体地位并未受到大的影响，仍然是元朝前期“最重要的官僚家庭”<sup>③</sup>。史天泽死后的神道碑载其诸子姓名及散官、职事官如下：

子男八人：曰格，荣禄大夫、湖广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曰棹，真定、顺天两路新军万户。曰棣，嘉议大夫、卫辉路总管。曰杠，资德大夫、湖广行中书省右丞。曰杞，嘉议大夫、淮东道肃政廉访使。曰梓，奉议大夫、澧州路同知。曰楷，奉训大夫、南阳府同知。曰彬，资德大夫、中书左丞。<sup>④</sup>

该碑由元初著名文士王磐（1202—1293）在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三年（1276）二月奉旨撰写，距史天泽去世整整一年。<sup>⑤</sup>不过上面这段文字却非王磐原文。以其中提到的史格、史杠二人官职为例，史格（1234—1291）担任湖广行省平章政事在至元二十七年（1290）<sup>⑥</sup>，史杠（1237—1315）担任湖广行中书省右丞更晚至成宗大德六年（1302）<sup>⑦</sup>，并且这都是两人生前担任的最后一个职务。可以推断，史天泽神道碑所载诸子官职都是他们历仕所至最后（实际上也是最高）的官职，是很晚才由史氏后人增补到碑文当中的。<sup>⑧</sup>从这份名单来看，天泽八子中官位最高的是长子史格，终任散官（荣禄大夫）、职事官（行省平章政事）均为从一品。其次为四子史杠和八子史彬，两人的终任散官（资德大夫）、职事官（行省右丞和都省左丞）均为正二品。但就任官时间而言，则史彬任正二品官要早于史杠。姚燧《江汉堂记》历数史

① 《史天泽家传》。

② [元]元明善：《平章政事廉文正王神道碑》，[元]苏天爵编：《国朝文类》卷六五，《四部丛刊》本。

③ 萧启庆先生语。见萧启庆《元代几个汉军世家的仕宦与婚姻》，收入氏著《蒙元史新研》，台北，允晨文化实业公司，1994年。

④ [元]王磐：《中书右丞相史公神道碑》（以下简称《史天泽神道碑》），《国朝文类》卷五八。《元史》卷一五五《史天泽传》所载其诸子职事官（未载散官）略同，唯史棣职务作“卫辉路转运使”，与《神道碑》有异。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点校本，第3663页。

⑤ 《史天泽神道碑》载：史天泽卒于至元十二年二月七日，“明年春二月，有旨命臣磐制墓隧碑文”。

⑥ [元]姚燧：《平章政事史公神道碑》（以下简称《史格神道碑》），《国朝文类》卷六二。参见[民国]吴廷燮《元行省丞相平章政事年表》，二十五史刊行委员会编：《二十五史补编》，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8269页。

⑦ [元]郭士文：《大元故资德大夫湖广等处行中书省右丞史公墓志》（以下简称《史杠墓志》），见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石家庄市后太原元代史氏墓群发掘简报》附录，《文物》1996年第9期。

⑧ 王磐碑文原稿应载有史天泽诸子在至元十三年所任官职，惜今不得其详。神道碑碑石亦久已不存。清人章学诚纂修《乾隆永清县志》的“文征”部分收录其碑文，题为《史丞相神道碑》，内容不出《国朝文类》所载范围。章氏跋曰：“旧志（按指以前的永清县志）录文而不载碑石有无，意久失之矣。”见《永清文征》卷二，《章氏遗书》本。

天泽死后忽必烈对其子孙的提拔重用时是这样表述的：

又诏其元子格以平章政事行省湖广，季子彬宅端揆于中，皆相继薨。又诏中子杠为中书左丞，行省湖广。<sup>①</sup>

这篇记文撰写于至元二十九年（1292），此时“宅端揆于中”亦即担任中书左丞的史彬已经不在人世，而史杠方才被提拔为湖广行省左丞。<sup>②</sup>更重要的是，虽然同样为正二品官，但中书左丞位居朝廷执政之列<sup>③</sup>，其实际地位当然要高于湖广行省左丞（或右丞）。即使是史格所任从一品的行省平章，在重要性上比中书左丞也有逊色。

大致在至元十八（1281）到十九年，与史天泽渊源颇深、以史氏门下之士自居的王恽（1227—1304）为其撰写了《家传》。<sup>④</sup>其中对当时天泽诸子的仕宦情况记载如下：

八子：格，中书右丞。棹，前新军万户。棣，中山知府。杠，提刑按察使。杞，前卫辉路总管。梓，澧州路同知。楷，终南阳府同知。彬，御史中丞。<sup>⑤</sup>

这八个职务还是以史格的中书右丞最高，但实际上史格所任并非中书省的右丞，而是“中书右丞行省湖广”，亦即湖广行省右丞。<sup>⑥</sup>真正在中央任职的仍然只有史彬，所任御史中丞是“非勋旧德望不轻授之”<sup>⑦</sup>的最高监察机构御史台副长官。<sup>⑧</sup>当然这是他担任中书左丞以前的事情。能够历任御史中丞、中书左丞两大要职，绝非一般人

① [元]姚燧：《江汉堂记》，《国朝文类》卷二八。

② 据《史杠墓志》，史杠在至元二十九年担任湖广行省左丞之前，所任职务为保定路总管。并且他在湖广左丞任上所带散官资善大夫是正二品下阶，而史彬任中书左丞时所带散官资德大夫却是正二品上阶。

③ 元朝中书省设官分为四级：丞相、平章政事、丞、参知政事。其中前两级称为宰相，后两级称为执政，合称宰执，今天在广义上也可以统称宰相。参见张帆《元代宰相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1—38页。

④ 关于王恽与史天泽的关系，参见蔡春娟《王恽在卫州的问学与交游》，中国元史研究会编：《元史论丛》第13辑，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

⑤ 《史天泽家传》。与《史天泽神道碑》不同，《家传》所载天泽诸子官职大部分都不是他们的终任职务，应当就是《家传》写毕之时所任职务，可据以推测《家传》的写作年代。据《史杠墓志》，史杠两次担任提刑按察使，其中至元十四至十六年在河东西道，十八至二十四年在江东建康道。又据《史格神道碑》，史格任湖广行省右丞约在至元十七年。如此，则《家传》写作不应早于至元十八年。而史彬从御史中丞职务上离任的时间当在至元十九年（具体讨论详见后文），故《家传》的写作也不会晚于此时。

⑥ 《史格神道碑》。

⑦ [元]苏天爵：《元故荣禄大夫御史中丞赠推诚佐治济美功臣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冀国董忠肃公墓志铭》，陈高华、孟繁清点校：《滋溪文稿》卷一二，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94页。

⑧ 当时元朝在南方设有江南行御史台（陕西行御史台尚未设立），官名、品级皆与中央御史台相同。但史彬所任，可以肯定是中央御史台的御史中丞，而不是江南行台御史中丞。理由有三。首先，提到史彬御史中丞职务的史料还有若干条（详见下文），没有一条与江南行台有关。其次，目前所见元朝前、中期江南行台历任御史中丞的名单当中，并无史彬。见[元]张铉编，田崇点校《至正金陵新志》卷六《官守志·题名》，南京，南京出版社，1991年，第271—272页。再次，史料记载，真人安筠曾因“御史中丞史公彬”的推荐，担任河东西道提刑按察司知事。见[元]安熙《故承事郎同知绵州事安公墓志》，《默庵先生文集》卷五，台湾《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影印清嘉庆十一年抄本。河东西道提刑按察司隶属于中央御史台。如果史彬所任系江南行台御史中丞，则其跨越辖区推荐河东西道提刑按察司官员人选，是不符合情理和制度的。

可以企及。大体可以说,就仕途显达而言,史天泽诸子中当推史彬为最。

史彬担任御史中丞似乎很早。《大元官制杂记》载:

(至元)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九日,上御万安阁。大司农、御史大夫李罗,司农卿兼御史中丞张文谦,御史中丞木八刺、史某,御史斡失乃奏:“先中书省闻禀过,巡行劝农官数年已见次第,按察司所管地面宽阔,官吏数少,可将劝农官并入按察司,通管勾当。乞降圣旨,遍谕随路。”奉旨:“与圣旨者。”事上,中书省臣复禀。有旨,谕诸路大小州城达鲁花赤、管民官吏并诸衙门官吏人等:“……准禀,将巡行劝农官并入按察司,委大司农、御史大夫李罗为头,管领大司农司、御史台勾当。”<sup>①</sup>

按《大元官制杂记》内容出自元朝政书《经世大典》的“治典”部分,明初被抄入《永乐大典》,清末文廷式又从《永乐大典》中抄出。辗转抄录难免出现错误,上面这条文件的年代就被抄错了。文件中提到的李罗,担任御史大夫是在至元十二年四月到十四年二月。<sup>②</sup> 张文谦任御史中丞则在至元十三年,次年即调任他职。<sup>③</sup> 余大钧先生据此指出:“此条系至元十三年之事,而非至元二十二年之事。”<sup>④</sup> 其说甚是。我们关注的是其中提到御史中丞“史某”。在与至元十三年接近的年份,除史彬外,史料中尚未发现还有其他姓史的御史中丞。可以推断,“史某”应当就是史彬。也就是说,史彬在至元十三年已经出任御史中丞。

史彬出任御史中丞,或许与其父史天泽的去世有关。至元十年,史天泽奉命与伯颜统军伐宋,到前线后因疾返回。忽必烈传旨安慰说:“画翦宋策汝也,成功而疾,汝安何言!诚有不讳,碑汝之勋,班汝之爵,予不可必死者之知,能知之者,非人与汝子孙耶?”<sup>⑤</sup> 虽然只说“碑汝之勋,班汝之爵”,但给予子孙授官也是蒙古统治者常用

① [元]佚名:《大元官制杂记》“巡行劝农司”条,《广仓学窘学术丛编》本。

② 《元史》卷八《世祖纪五》:至元十二年四月“丁卯,以大司农、御史中丞李罗为御史大夫”,第166页。卷九《世祖纪六》:至元十四年二月“丁亥……以大司农、御史大夫、宣徽使兼领侍仪司事李罗为枢密副使,兼宣徽使,领侍仪司事”,第198—199页。

③ [元]李谦《中书左丞张公神道碑》:“(至元)十三年,拜御史中丞。时阿合马威权日炽,恣为不法,虑台宪发其奸,奏罢诸道提刑按察司以撼内台。居数日,公奏复之。自知为奸臣所忌,不辞去未已也,亟请避位。明年,拜昭文馆大学士,领太史院事。”见《国朝文类》卷五八。

④ 余大钧:《蒙古朵儿边氏李罗事辑》,元史研究会编:《元史论丛》第1辑,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按《元史》卷八七《百官志三》“大司农司”条(第2188页):“(至元)十四年罢,以按察司兼领劝农事。”所言与上引《大元官制杂记》显系一事,可为余先生观点的旁证。盖并劝农官入按察司之举,定义于至元十三年,而颁行落实于至元十四年。

⑤ [元]姚燧:《江汉堂记》。元人王博文所撰史天泽《行状》中保存了这段圣旨从蒙语直译过来的汉语白话稿。略云:“人底勾当你勾当来,未成就其间你得病也。心里休忧劳者。如今既这般呵,成就也者。便不成就呵,成就的一般。你起头儿[来],恐怕你老了时立碑呵,你知也那不知,咱怎生理会得?众人每、你的子孙每知也者!”这份《行状》保存于20世纪末发现的真定史氏家族家谱残卷,题为《丞相行状》。今转引自孟繁峰《谈新发现的史氏残谱及史氏元代墓群(续)》据《史氏残谱》录文,《文物春秋》1999年第4期。因辗转抄录,录文可能有不准确之处,今仍其原貌,唯标点有所更正。

的酬功手段。至元十三年元朝已基本平定南宋，史彬恰在此时当上御史中丞，可能就是忽必烈对去世未久的史天泽论功行赏之举。

关于史彬担任御史中丞一事，还可以查到其他一些零星的记载。胪举如下。

一条写作时间明确可考的材料是刘敏中《代史中丞路祭故副枢董公文》：

公之纯全，天实异之，公之事业，人共识之。彬也不才，幸托姻娅，薰炙陶冶，日渐月化。始之未立，忧其弗充，既立而成，勉其所终。终始之德，欲报弗可，岂期一旦，遽而舍我！攀援輶车，长号吁天，天如不闻，庶达九泉。<sup>①</sup>

题中的“副枢董公”系指董文忠。“史中丞”，根据文中“彬也不才”之句，无疑就是史彬。董文忠是史彬的岳父（关于这层姻亲关系，下文再述），官至金书枢密院事，于至元十八年十月二十五日去世，十二月六日下葬。<sup>②</sup>“路祭”要在下葬当日进行，可知这篇祭文必然作于至元十八年十二月六日前夕。作者刘敏中（1243—1318），至元十一年由中书省掾史出职为兵部主事，继而担任监察御史。<sup>③</sup>此时他应当正在监察御史任上，因而为上司史彬代撰祭文。<sup>④</sup>与这篇祭文时间相近的资料还有王恽《大元故真定路兵马都总管史公神道碑》：

公讳楫……以至元九年二月遘疾，越廿日薨於正寢，春秋五十有九……公薨之十年，嗣子焯、熒介公弟征东经略使枢、御史中丞彬，以神门之表来禱。<sup>⑤</sup>

碑主史楫（1214—1272）是史天泽长兄天倪之子，卒于至元九年，其“薨之十年”，也是在至元十八年。史楫于史彬为从兄，故碑中称“公弟……御史中丞彬”。

有的资料仅言“史中丞”而不及其名，但根据时代和内容来看显系史彬。如王恽词《木兰花慢·寿史中丞》：

相门佳公子，都忘却，贵人骄。有万石忠勤，伯鱼诗礼，才气飘飘。风流谢家玉树，说妙龄英誉冠东朝。桂殿亲承弓研，豸冠高映金貂。

两台清议耸风标，睿眷见恩饶。要宝瑟朱弦，羹梅伊鼎，试手更调。凤凰池，还浴凤，看羽毛奕世动云霄。郑重识寒贞节，青松千尺难凋。<sup>⑥</sup>

考虑到作者王恽与真定史氏家族的密切关系，词中被誉为“相门佳公子”的

① [元]刘敏中：《代史中丞路祭故副枢董公文》，《中庵集》卷一六，《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清抄本。

② [元]姚燧：《金书枢密院事董公神道碑》，《国朝文类》卷六一。按元枢密院佐贰官中，枢密副使正二品，金书枢密院事正三品，祭文称董文忠为“副枢”系笼统言之。王恽五言诗《九门道中》诗序也提到董文忠下葬于至元十八年十二月六日，见《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三。

③ [元]曹元用：《敕赐故翰林学士承旨赠光禄大夫柱国追封齐国公刘文简公神道碑铭并序》，原载元刻本《中庵集》卷首，转引自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24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1年，第266页。

④ 刘敏中自己为董文忠另外撰写了《故副枢董公路祭文》，亦载《中庵集》卷一六。

⑤ 《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五四。

⑥ 《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七五。王恽另有七言诗《赠史中丞并王高二侍郎》，亦当指史彬，见《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二三。

“史中丞”只能是史彬。这首词使用了西汉“万石君”石氏家族和东晋南朝陈郡谢氏家族的典故，来称颂史彬的家世、人品、才华、风度，并且将史彬的学养与孔子之子孔鲤（字伯鱼）相比拟，可谓阿谀备至。更重要的是，词中透露了有关史彬早年经历的重要信息，那就是他应当出身于皇后怯薛。“桂殿”，在古代诗词中往往比喻后妃居住的宫殿。<sup>①</sup>“东朝”，在元朝则有指代皇后的含义。<sup>②</sup>“亲承弓斨”、“高映金貂”都表明了史彬的怯薛身份。忽必烈的皇后察必（？—1281）对当时朝政颇有影响，在她身边供职，“妙龄”时就“英誉冠东朝”，对于史彬进一步获取忽必烈的“眷眷”恩宠是十分关键的。这大概也正是史彬在仕途上超越诸位兄长的主要原因。

还有资料仅言“中丞”，既不及名，亦不及姓，仍然可以推断是史彬。这就是魏初的七言诗《寿御史中丞》：

丞相勋名纪太常，君侯忠鯁复腾光。青宫意注文贞笏，白简风生肃政堂。守道自当成豹变，击强初不待鹰扬。黑头事业磨崖颂，要共生平日月长。<sup>③</sup>

魏初（1232—1292），《元史》卷一六四有传，与王恽一样曾于忽必烈一朝长期在监察系统任职。在进行了本文前面的讨论后，则魏初诗中首联“丞相勋名纪太常，君侯忠鯁复腾光”，一看就知道是在说史天泽、史彬父子。“青宫”一词意同“东宫”，或许还是指皇后察必，也可能指皇太子真金。尾联“黑头事业磨崖颂，要共生平日月长”表达了作者对史彬未来仕途和成就的期望。“黑头”系借用古代“黑头

① 参见《汉语大词典（缩印本）》，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年，第2552页。按“桂殿”一词的这种用法在古代诗文中相当多见，现就元人作品暂举二例。萨都刺《和马伯庸除南台中丞余驰驿远迓至京复改除徽政以诗赠别》：“江南驿使路遥遥，远赴龙门看海潮。桂殿且留修月斧，银河未许渡星貂。”见殷孟伦、朱广祁点校《雁门集》卷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65—166页。元顺帝即位前夕，马祖常（字伯庸）除江南行台御史中丞，时任江南行台掾史的萨都刺奉命北上迎接。至京后顺帝即位，设徽政院主管皇太后（即文宗皇后卜答失里）位下事务，祖常改授徽政院官，不复南行，故诗云“桂殿且留修月斧，银河未许渡星貂”。“桂殿”在这里表面上写的是神话中的月宫（这也是“桂殿”的另外一个含义），实际上就是代指卜答失里。又，余阙《正旦贺笺》：“椒盘献颂，仰瞻玄武之光；桂殿迎春，早应高祺之瑞。”见《青阳先生文集》卷六，《四部丛刊续编》本。这首贺笺系顺帝在位前期余阙为湖广行省起草（时余阙任湖广行省左右司郎中），应当是上呈皇后的，其中提到古代的婚姻和生育之神“高祺”可以为证。同样，它也使用了“桂殿”的典故。

② “东朝”意同“东宫”，在古代本来指皇太后或皇太子的居所。但在元朝，它还有另外一个含义，即指主位宫帐，或云皇帝（大汗）的第一斡耳朵，进而代指主守该宫帐（斡耳朵）的皇后。窝阔台时，皇后脱列哥那在汉地使用的头衔中就有“主东宫事”字样（以上参阅蔡美彪《脱列哥那皇后史事考辨》，中国蒙古史学会编：《蒙古史研究》第3辑，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89年）。史载当时主政的耶律楚材“召名儒梁陟、王万庆、赵著等，使直释九经，进讲东宫”（《元史》卷一四六《耶律楚材传》，第3459页），此处的“东宫”只能理解为脱列哥那皇后。在王恽这首词中，“东朝”当然可能代指皇太子，但结合“桂殿”一词来判断，仍以代指皇后可能性较大。

③ [元]魏初：《青崖集》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公”或“黑头三公”的典故<sup>①</sup>，与上引王恽诗中“羹梅伊鼎，试手更调”，“凤凰池，还浴凤，看羽毛奕世动云霄”等句用意接近，皆勉励（或奉承）史彬继承父亲的事业，在不远的将来官居宰辅，留名青史。从史彬的家世、出身及其在当时的年龄、官位来看，这种期待绝不是没有道理的。

在此顺便补叙史彬的年龄问题。大蒙古国时期，史彬的祖父史秉直委托僚属崔铉为家族撰写《史氏庆源之碑》<sup>②</sup>，于庚子年（窝阔台十二年，1240）九月十七日立石。据碑文所载，当时史天泽已有子五人，皆年幼尚未命名，仅存乳名。史彬为天泽第八子，则出生必晚于此时。如上文所述，他在至元十三年（1276）六月已经担任御史中丞。即使其出生于庚子年岁末（也就是说他与天泽六子史梓、七子史楷相继在庚子年最后的三个多月出生，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微弱的），出任中丞时也还不足三十七岁，称得上风华正茂，前程似锦。明乎此，才能充分理解“黑头事业磨崖颂，要共生平日月长”诗句的意义。

既然如此，这样一位翱翔宦海如鱼得水的人物，后来的情况到底怎么样？曾受到时人高度期待和吹捧，却又因何长期被后人忽视呢？

## 二 《元史》纠谬

史彬担任御史中丞一事，曾有学者正面述及。<sup>③</sup>而对于他的中书左丞之职，却几乎无人注意，偶有注意者也未予重视。<sup>④</sup>这与《元史》记载的疏谬有很大关系。

《史天泽神道碑》所载史彬的“中书左丞”职务是否可信？现存史料中固然可以找到个别旁证（例如前引姚燧《江汉堂记》），但首要的验证办法应当是核查《元史》卷一一二《宰相年表》。核查结果，表中所载元朝前、中期全部中书左丞名单，除文宗朝的史惟良外<sup>⑤</sup>，只有至元二十二年（1285）栏中有一个“史”字，仅

① 参见《晋书》卷六五《王恂传》、卷七七《诸葛恢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第1756、2041页；《魏书》卷一八《临淮王彧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第419页。

② 见《永清文征》卷二。

③ 例如郝时远在《元代监察制度概述》一文中说：“在汉人御史中丞中，也有一些世家子孙。这些汉人世家……的子弟能以‘勋旧’之后，位居御史中丞之职。如史天泽之子史彬、张柔之孙张珪等。”但仅是点到为止，并未继续探讨。载元史研究会编《元史论丛》第3辑，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④ 前揭萧启庆《元代几个汉军世家的仕宦与婚姻》一文，其中对蒙元汉人世侯家族仕进情况的研究是迄今为止最详尽的。文章注意到史彬的“中书左丞”官职，将其列入仕进统计资料，但又好像不太相信这条资料的真实性，因而评论说：“史氏第三代多以兵马立功，似乎缺乏天泽的政治材能，不能入居中枢，影响大政。”

⑤ 史惟良（1273—1347），郢城人，事迹见〔元〕黄潜《集贤大学士荣禄大夫史公神道碑》，《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二六，《四部丛刊》本。他与真定史氏完全没有关系。

存姓而脱名。<sup>①</sup>关于这位至元二十二年的中书左丞史某究竟是何人，钱大昕较早提出：

以《本纪》考之，盖史枢也。<sup>②</sup>

汪辉祖《元史本证》持相同看法。<sup>③</sup>可能是受到他们的影响，《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和道光本《元史》均于此处“史”字之下径补“枢”字。魏源、屠寄、柯劭忞也都在各自新修元史的宰相年表至元二十二年中书左丞栏直书“史枢”。<sup>④</sup>中华书局点校本《元史》本卷校勘记在采纳钱大昕意见的同时，又新增《元史·卢世荣传》为证。<sup>⑤</sup>前人意见如此一致，似乎已无重新讨论的必要。下面就来看看相关的两条证据。

《元史》卷一三《世祖纪十》记载：

（至元二十一年）十一月……辛丑，和礼霍孙、麦术丁、张雄飞、温迪罕皆罢。前右丞相安童复为右丞相，前江西榷茶运使卢世荣为右丞，前御史中丞史枢为左丞，不鲁迷失海牙、撒的迷失并参知政事，前户部尚书拜降参议中书省事。<sup>⑥</sup>

同书卷二〇五《卢世荣传》亦载：

至元二十一年十一月辛丑，召中书省官与世荣廷辨，论所当为之事。右丞相和礼霍孙等守正不挠，为强词所胜，与右丞麦术丁，参政张雄飞、温迪罕皆罢。复起安童为右丞相，以世荣为右丞。而左丞史枢，参政不鲁迷失海牙、撒的迷失，参议中书省事拜降，皆世荣所荐也。<sup>⑦</sup>

两条资料所记为一事，互有详略。前者提到新宰执集团部分成员以前的职务，例如点明史枢是“前御史中丞”，后者则说明史枢以下诸人的任命出自卢世荣推荐，看上去彼此支持，凿凿有据。然而我们相信，其中提到史枢的名字是错误的。

史枢（1221—1288），字子明，也是真定史氏家族成员，与史彬行辈相同，系史天泽次兄天安之子，《元史》卷一四七有传。通过传文，可以扼要地了解史枢在忽必烈一朝的仕宦经历。忽必烈即位之初，史枢以征行万户之职参与讨伐阿里不哥、李璫

① 《元史》，第2800页。

② [清]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九二《元史七·宰相年表》，陈文和主编：《嘉定钱大昕全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713页。

③ [清]汪辉祖著，姚景安点校：《元史本证》卷一四《证误十四·宰相年表一》，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40页。

④ [清]魏源：《元史新编》卷六〇《宰相表》，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光绪三十一年邵阳魏氏慎初堂刊本；[清]屠寄：《蒙兀儿史记》卷一五七《宰相表》，北京市中国书店影印1934年屠孝宦刊本；[民国]柯劭忞：《新元史》卷三一《宰相年表》，中国书店影印1930年庚午重订本。

⑤ 《元史》，第2835—2836页。

⑥ 《元史》，第270页。

⑦ 《元史》，第4564页。



等重要战役。至元四年，拜左壁总帅，抵御南宋在四川的进攻。七年，授凤州经略使，平定高丽金通精之乱。十二年，复以万户从伯颜伐宋，授安吉州安抚使。此后的情况则是：

十四年，移疾还。十九年，起为东京路总管，辞不赴。二十三年，拜中奉大夫、山东东西道宣慰使，治济南，后又治益都。二十四年，卒。<sup>①</sup>

全传并无史枢担任中书左丞或御史中丞的记录。或许有人会将此归咎于《元史》叙事疏漏，可是，现今所见史枢另外的传记资料也都没有相关记载。

20世纪末，在石家庄市西北郊岳村发现了一份真定史氏家族的家谱残卷，其中存有以前未见文献收录的史枢神道碑文。这篇碑文尽管多处字句残缺，但看上去并没有大段的内容脱失。碑中所记史枢履历，较之《元史》本传细节虽详，而要点不出其外。惟言史枢拜山东宣慰使在至元二十二年，与《传》小异。<sup>②</sup>碑文将史枢一生仕途概括为“六拜军帅，三领州牧”<sup>③</sup>，也就是说，所历官职基本都是军官和地方行政长官。碑文还交待，史枢自至元十四年至二十二年长期在家闲居，“以琴书自娱”，未言其曾于二十一年出任中书左丞，也没有提到他担任过御史中丞。这不禁使我们从根本上怀疑《元史·世祖纪十》和《卢世荣传》的相关记载。如果史枢确曾出任这两个要职，哪怕只有一天，其神道碑也断无不记之理！

史枢死后七年，友人王恽为他撰写了一份回忆性质的《哀辞》。文中仅称之为“宣慰使史公”、“故宣慰史侯”，仍然不见与中书左丞、御史中丞两职有关的任何信息。<sup>④</sup>王恽与史枢交谊甚厚，一度“时接燕谈”，梦中相见尚“恋恋不已”。<sup>⑤</sup>对于后者莅任省、台要职的显赫履历，追忆其生平时岂能无一言及之？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史枢其实并无这样的履历。

此外，时人诗文中提到史枢的零散材料还有一些。这些材料或称史枢为“总帅”<sup>⑥</sup>，

① 《元史》卷一四七《史枢传》，第3485页。

② [元]佚名：《大元故中奉大夫山东东西道宣慰使史公神道碑铭并序》（以下简称《史枢神道碑》），见前揭孟繁峰《谈新发现的史氏残谱及史氏元代墓群（续）》自《史氏残谱》录文。碑文作者署名残损，仅存其职衔“翰林学士〔知〕制造同修国史正奉大夫”。孟氏根据此一职衔，加上碑文中有一处提到作者之名疑似与“磐”字相通，推断他就是《史天泽神道碑》的作者王磐，恐误。按王磐累官至翰林学士承旨，于至元二十一年以资德大夫散阶（正二品上）致仕。见[元]苏天爵编，姚景安点校《元朝名臣事略》卷一二《内翰王文忠公》，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246页。而《史枢神道碑》作于至元二十六年，作者犹署翰林学士（未云致仕），散阶正奉大夫（从二品上），足见并非王磐。我们怀疑这名作者或许是真人李槃，但因《史氏残谱》原件没有公布，无法直接辨识碑文文字，未敢妄断，仅录以备考。

③ “军帅”，《史氏残谱》所录《史枢神道碑》原文作“军师”，今从孟繁峰校改。

④ [元]王恽：《故中奉大夫山东东西道宣慰使史公哀辞》，《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五。

⑤ [元]王恽：《故中奉大夫山东东西道宣慰使史公哀辞》，《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五。

⑥ [元]刘因：《友松轩铭》，《静修先生文集》卷二〇，《四部丛刊》本；[元]王恽：《宿睢宁梦总帅史子明》，《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一三。

或称其为“经略”<sup>①</sup>；或称其为“宣慰”<sup>②</sup>，但却没有称他为“左丞”或“中丞”的。也大体说明同样的问题。

总之，尽管有《世祖纪十》和《卢世荣传》的支撑，但《元史·宰相年表》至元二十二年栏中的中书左丞史某并不能认定为史枢，钱大昕的考证结果是错误的。后人以讹传讹，均应改正。不是史枢会是谁呢？显然是史彬。首先，《史天泽神道碑》明确记载了史彬的“中书左丞”官衔，姚燧《江汉堂记》可为旁证。其次，《元史·世祖纪十》提到这位中书左丞的身份为“前御史中丞”，而史彬在此之前担任过御史中丞，有多条资料为证，可以确定无疑。再次，史彬与史枢出自同一家族，行辈相同，名字接近。史彬出任中书左丞时，史枢正在家闲居，并无现任官衔。因此史料将史彬的左丞身份误置于史枢头上，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情有可原的。

《元史》谬误既明，致误原因尚可略赘数语。《世祖纪十》与《卢世荣传》的史源都是元成宗朝修纂的《世祖实录》<sup>③</sup>，因此错误有可能在《实录》中即已出现。至于究竟是有意篡改，还是无心之失，颇难辨别。按说《实录》修纂时间与其所载时代相距甚近，人证犹存，档案具在，却将十几年前高级官员的名字草率写错，未免不尽符合情理，则似以有意篡改可能性稍大。但若系有意，又到底出自何种动机，有何具体背景，就更加不易判断了。另一方面，错误或许也会产生于《元史》成书期间。《世祖纪十》和《卢世荣传》先有一处不慎致误，统稿时再将另外一处据以误改，反使后人以为两者前后呼应，不知实则一错俱错，这种可能也是无法排除的。要之材料匮乏，暂时只能悬空揣测而已。

### 三 史彬之死

史彬荣任中书左丞的经历竟然被《元史》湮没，与其在任时间短暂有关。事实上，史彬不久以后就去世了。在此需要重复引用前引姚燧《江汉堂记》的一句关键记载：

又诏其（引者按：指史天泽）元子格以平章政事行省湖广，季子彬宅端揆

① [元]王恽：《玄猿赋》，《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一；《题桃源图后》，《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大元故真定路兵马都总管史公神道碑》，《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三。

② [元]滕安上：《挽史宣慰章》，《东庵集》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元]王恽：《史宣慰子明友松亭诗》，《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二二。

③ 《元史》本纪内容源自实录，人所共知。而《卢世荣传》所在的卷二〇五《奸臣传》，其实也是从实录中取材的。如《传》序所云：“然奸巧之徒……其行事之概，亦或散见于实录编年之中，犹有《春秋》之意存焉。谨撮其尤彰著者，汇次而书之，作《奸臣传》，以为世鉴。”第4557页。

于中，皆相继薨。

“皆相继薨”，意谓史格、史彬兄弟二人都在授官以后不久去世。我们知道史格于至元二十七年被任命为湖广行省平章政事（月份不详），其去世时间则是二十八年七月十五日<sup>①</sup>，距其升任行省平章长则一年有余，短则不足一年。史彬的去世，距其升任中书左丞的时间大概也差不多。而且需要强调的是，他的去世比较突然。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唯一线索的仍然是王恽。王恽著有《左丞史公哀辞》，是一首有序的悼亡诗，内容如下：

左丞史公之薨，客有云云者。余曰：事机之来，虽理有难处，度不违于义，其宠辱有不足惊者。当克明之无定力以顺受，轻则伊郁而自沮，重则至忧悸而殒越，正以不安而无定力故也。呜呼！史公不少隐忍以光先正之业，而至于斯，其命耶？抑以有未安于所受之正耶？于是作是诗哀之。

两鬓金貂汉九卿，大阶平自柏台清。尽将事业传钟鼓，不特家声藉父兄。自忖行藏无所嫌，此生荣辱不须惊。辨奸听彻唐君说，泪洒春风满彘纒。<sup>②</sup>

关于诗中的悼亡对象，前人或以为是史枢<sup>③</sup>，或以为是史杠<sup>④</sup>，显然都是不对的。<sup>⑤</sup>根据前文的讨论，相信读者也会同意，他只能是史彬。这首《哀辞》告诉我们，史彬之死，系因“伊郁而自沮”发展到“忧悸而殒越”，死于巨大的精神压力（甚至不排除自杀的可能）。压力从何而来呢？诗序中“抑以有未安于所受之正耶”的感叹为我们提示了答案。史彬担任中书左丞是出自卢世荣推荐，而卢世荣却在不久之后垮台了——压力就来源于此。

卢世荣（？—1285），大名人，商人出身。至元中期，通过贿赂权臣阿合马被任命为江西道榷茶转运使，后因赃罪免职。阿合马死后，“朝廷之臣讳言财利事，皆无以副世祖裕国足民之意”<sup>⑥</sup>。世荣被荐有理财之能，得到忽必烈召见，奏对称旨，于至元二十一年十一月出任中书右丞。当时中书省的右丞相安童主要是以蒙古勋贵身份挂名首相，卢世荣位居其次，实际上主持中书日常政务，“身当要路，手握重权，虽其位在丞相之下，朝省大政实得专之”<sup>⑦</sup>。左丞史彬以下一千中书省要员，都出自他

① 《史格神道碑》。

② 《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一九。诗中“两鬓”之“两”字、“钟鼓”之“鼓”字原系墨钉，今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秋涧集》补正。

③ 陆峻岭编：《元人文集篇目分类索引》，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9页。

④ 王德毅等编：《元人传记资料索引》，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28页。

⑤ 如本文上节所言，史枢实际上并没有担任过左丞。王恽为他另撰有《故中奉大夫山东东西道宣慰使史公哀辞》，其中反映的内容与这篇《左丞史公哀辞》全无关系。史杠倒是担任过左丞（在湖广行省），但却卒于仁宗延祐二年（1315），远在王恽去世十多年之后，王恽又怎能预作《哀辞》来悼念他呢？

⑥ 《元史》卷二〇五《卢世荣传》，第4564页。

⑦ [元]陈天祥：《论卢世荣奸邪状》，《国朝文类》卷一四。

的推荐。<sup>①</sup> 柄政期间，卢世荣推出一系列新的理财措施，但具体工作尚未充分展开，就受到激烈弹劾，于至元二十二年四月撤职下狱，十一月被处死。关于卢世荣理财活动的始末，治元史者大都比较熟悉，但史天泽的幼子史彬也曾卷入其中，初则因以进拜执政，终则由之忧悸致死，却完全没有人注意到。

史彬受到卢世荣推荐并卷入其理财活动，其背景颇值得探讨。同时被卢世荣荐入中书省的另外几名官员，除拜降出身不明外<sup>②</sup>，不鲁迷失海牙和撒的迷失都是与史彬身份相近的勋贵子弟。不鲁迷失海牙出身于畏兀儿廉氏家族，是名臣廉希宪之弟，汉名廉希恕。<sup>③</sup> 撒的迷失则是世任怯薛的康里贵族。<sup>④</sup> 卢世荣还曾打算举荐出身畏兀儿偃氏家族的都尔弥势为参知政事，但遭到拒绝。<sup>⑤</sup> 这些情况都体现出卢世荣极力拉拢勋贵子弟与自己共事的企图。如我们所知，卢世荣拔起疏远，出身低微，“素无文艺，亦无武功”<sup>⑥</sup>，在重视“根脚”<sup>⑦</sup>的元朝统治集团当中，其基础之浅远过于忽必烈的另外两名理财大臣阿合马和桑哥。他对自己这方面的劣势显然有清醒认识，因此才会将史彬等有“根脚”的勋贵子弟拉入新一届执政集团。另一方面，尽管史无明文，但史彬诸人应当在政见上与卢世荣颇有一致之处，至少被后者视为有合作的基础或可能。否则，与他们一同“组阁”是没有意义的。

在《元史》中，阿合马、卢世荣、桑哥按时间次序相继被列入《奸臣传》。而当

- ① 卢世荣在中书省宰执中位居次席的状况持续时间很短。至元二十二年正月下旬，合必赤合（或作阿必失哈）被任命为中书平章政事。二月末，复以忽都鲁为平章，瓮吉刺带为左丞相。此三人官位都在卢世荣之上。他们与卢的关系不很清楚，至少在卢倒台时并未随之去职，而是一直任职到至元二十三年七月。参见《元史》卷一三《世祖纪十》，第273、275页；卷一四《世祖纪十一》，第291页；卷一二《宰相年表》，第2800—2801页。
- ② 就目前所知，元朝有两位比较著名的拜降。一位出自蒙古札剌儿氏，系元朝前期著名将领阿剌罕之子，袭父职为万户，累官至河南省平章政事，事迹略见[元]虞集《曹南王勋德碑》，《道园学古录》卷二四，《四部丛刊》本。另一位是畏兀儿人，忽必烈时曾任江浙行省理问官、江西行省都镇抚、庆元路治中等职，武宗时官至资国院使，《元史》卷一三一有传（第3200页）。从履历上看，二人似乎都不是卢世荣荐举为参议中书省事的前户部尚书拜降。
- ③ 不鲁迷失海牙系廉姓，见《元史》卷一一二《宰相年表》，第2801页。综合有关零散资料来看，他与《元史》卷一二五《布鲁海牙传》（第3072页）提到的布鲁海牙第三子、廉希宪之弟廉希恕应为同一人。参见[清]屠寄《蒙兀儿史记》卷一五四《氏族表·色目氏族上》。并参王梅堂《元代内迁畏兀儿族世家——廉氏家族考述》，中国元史研究会编：《元史论丛》第7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
- ④ 撒的迷失的出身情况不见于传世文献记载。20世纪50年代，北京出土了撒的迷失子孙的几方墓志，包括《大元故中奉大夫陕西行省参知政事追封云中郡公铁著墓志铭》、《故承直郎崇祥规运提点所大使卜颜帖木儿墓志铭》、《故康里氏改的公墓志铭》等，透露了撒的迷失家族的一些重要信息。这批墓志现辗转保存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蒙古源流文化产业园区，尚未正式公布。
- ⑤ [元]欧阳玄：《高昌偃氏家传》，《圭斋文集》卷一一，《四部丛刊》本。《家传》称卢世荣为“卢懋”，这应当是他的本名。
- ⑥ [元]陈天祥：《论卢世荣奸那状》。
- ⑦ “根脚”是元朝俗语，意谓出身。元末人权衡总结说：“元朝之法，取士用人，唯论根脚。”见权衡著，任崇岳笺证《庚申外史笺证》，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54页。

代学者，特别是一些经济思想史专家，似乎倾向于将卢世荣与阿合马、桑哥区别对待，对卢氏的理财思想和措施给予了比较积极的评价。<sup>①</sup>不过，卢世荣毕竟是阿合马提拔起来的，其出任中书右丞又出于桑哥的推荐，三人先后理财，在政策和人事上还是会有较大的连续性。拜相次日，卢世荣即与安童联名上奏：“阿合马专政时所用大小官员，例皆奏罢，其间岂无通才？宜择可用者仍用之。”<sup>②</sup>他引用的参议中书省事拜降，具有“前户部尚书”资历，很可能就是阿合马当政时期的户部尚书。史彬得到卢世荣举荐，或许也说明同样的问题。

与拜降类似，史彬在至元二十一年十一月进入中书省时的身份是“前御史中丞”，亦即已经卸任的御史中丞。据本文第一节所引刘敏中《代史中丞路祭故副枢董公文》，直到至元十八年十二月初，史彬还在御史中丞任上。那么他究竟卸任于何时？目前没有直接的材料回答这一问题，但大体可以判断，他是在阿合马死后卸任的。阿合马于至元十九年三月遇刺，随后罪状败露，被抄家戮尸。一时间“凡阿合马所用之人皆革去”，“穷治党与，纤悉无遗”，甚至有“守门卒隶，亦不可留”的提议。<sup>③</sup>御史台也因监察不力遭受整顿，“台臣以失言并逐”，只有一位治书侍御史杜思敬获特旨留任。<sup>④</sup>估计史彬就在此时被免去了御史中丞职务。

据前引《大元官制杂记》，史彬最晚在至元十三年六月已经担任御史中丞。当时与史彬同居御史中丞之任的还有张文谦（兼司农卿）和木八剌。<sup>⑤</sup>元朝御史中丞大多数时候设二员，一员为蒙古或色目人，一员为汉人。至元十三年中丞达到三员，其中汉人中丞有两员，应当是一种特殊情况。次年张文谦离任，此后直到至元十九年，除史彬外，史料中暂时还没有发现其他汉人担任御史中丞之职，表明他很可能是这段时间唯一的汉人中丞。<sup>⑥</sup>至元十九年，终于出现了一名新的汉人中丞崔彧。<sup>⑦</sup>我们相信，崔彧正是取代了史彬的位置。

① 参见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下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52—263页；赵靖主编《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第三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21—428页。

② 《元史》卷一三《世祖纪十》至元二十一年十一月壬寅，第270页。

③ 《元史》卷一七三《崔彧传》，第4039页。

④ [元]柳贯：《谥议·杜思敬谥文定》，《柳待制文集》卷八，《四部丛刊》本。

⑤ 据《元史》卷一三四《也先不花传》（第3266页），木八剌是蒙古克烈部人，蒙哥汗时怯薛必闾赤长子鲁合次子。他似乎比史彬更早离开中丞岗位。阿合马遇刺时，御史台的蒙古中丞为也先帖木儿，见《元史》卷二〇五《阿合马传》，第4563页。他有可能就是许衡的学生、后追封咸宁王的克烈部人也先帖木儿。关于后者，参见张帆《读〈元典章〉校〈元史〉》，《文史》2003年第3辑。

⑥ 《永乐大典》卷二六〇七引《经世大典·御史台》谓至元十八年曾“添设”御史中丞二员（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第1277页），然《元史》纪、志均不载其事，亦未见其他史料旁证，详情不得而知。

⑦ 《元史》卷一七三《崔彧传》（第4039页）：“（至元）十九年，除集贤侍读学士……寻奉旨钩考枢密文牍，由刑部尚书拜御史中丞。”未载拜中丞的月份。然同书卷一二《世祖纪九》系崔彧钩考枢密文牍之事于至元十九年十月癸卯（第247页），其拜中丞应当即在此前后。无论如何，稍后在十二月癸卯，崔彧已经以御史中丞身份出现在本纪当中了（第249页）。

由此可以对史彬和阿合马的关系稍加讨论。就目前所知，史彬任御史中丞为时大约六年，这段时间正是阿合马权势的鼎盛时期，史称其“在位日久，益肆贪横……内通货贿，外示威刑，廷中相视，无敢论列”<sup>①</sup>。作为最高监察机构御史台日常工作负责人之一的史彬<sup>②</sup>，对此不能不承担责任，免职势在必行。而如果换个角度看，史彬能够在阿合马专权时期长期稳居御史中丞要职，又似乎表明他们之间形成了一种相安无事的默契。我们看到，在史彬担任中丞期间，御史台基本上没有对阿合马专权形成牵制和威胁。起初尚有个别监察御史对阿合马提出弹劾<sup>③</sup>，后来连此类个别事例也见不到了。正如时人所批评：“台官以下，察院之属，闭口吞声，见如不见，宴居高坐，闻若不闻”<sup>④</sup>，“迨其（引者按：指阿合马）事败，然后接踵随声，徒取讥笑”<sup>⑤</sup>。监察部门出现这种“不作为”状态，根本原因当然在于忽必烈对阿合马的信任、支持。<sup>⑥</sup>但就史彬个人而言，与阿合马能够共处也是有原因的。首先，史彬出身于察必皇后怯薛，而阿合马原来恰好是察必皇后的从嫁奴仆<sup>⑦</sup>，他们应当很早就彼此认识，或许还有一定的交往。其次，史彬大约不是一个很有棱角的人，原则性不强，缺乏嫉恶如仇的斗争精神。前引魏初《寿御史中丞》诗有句云“守道自当成豹变，击强初不待鹰扬”，就委婉地写出了他这方面的性格特征。<sup>⑧</sup>正因如此，以“沮抑台察”<sup>⑨</sup>著称的权相阿合马才能够容忍史彬在御史中丞位置上坐了六年之久。<sup>⑩</sup>

① 《元史》卷二〇五《阿合马传》，第4562页。

② 史彬担任御史中丞期间，御史台最高长官御史大夫一直是博儿术之孙玉昔帖木儿（蒙古阿儿剌氏），起初另一名显贵字罗（蒙古朵儿边氏）同时担任御史大夫，但他在至元十四年二月就离任了。玉昔帖木儿身居怯薛要职，对于御史台事务只能是“务振宏纲，弗亲细故”（〔元〕阎复：《太师广平宪克王碑》，《国朝文类》卷二三），台内日常工作实际上由御史中丞负责。

③ 目前所知在这段时间弹劾过阿合马的监察御史有程思廉和白栋，时间分别不晚于至元十六、十七年。二人不仅弹劾未遂，而且都被阿合马罗织罪状，一度关入监狱，随后又从御史台调离。见〔元〕王思廉《河东廉访使程公神道碑》，《国朝文类》卷六七；〔元〕姚燧《河南道劝农副使白公墓碣铭》，《国朝文类》卷五五。

④ 〔明〕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一六二《建官》引赵天麟奏议，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永乐十四年内府刊本。

⑤ 《元史》卷一七三《崔彧传》，第4039页。

⑥ 参见郝时远《元世祖时期台察与权臣的斗争》，元史研究会编：《元史论丛》第4辑，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

⑦ 参见刘迎胜《从阿合马的身份谈起》，中国元史研究会编：《元史论丛》第9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年。

⑧ 史彬的父亲史天泽即以为人圆融、善于明哲保身著称。“其行已也，知时识势，其临事也，应变制宜”，被称赞有郭子仪、曹彬之风（见〔元〕王博文《丞相行状》。《元朝名臣事略》卷七《丞相史忠武王》亦有转引，第122页）。这样的政治风格应当也会对史彬有所影响。

⑨ 《元史》卷二〇五《阿合马传》，第4561页。

⑩ 这方面可以举出一个反例。在至元十三年同任御史中丞的张文谦，由于在罢废提刑按察司问题上与阿合马发生冲突，“自知为奸臣所忌”，不安于位，因而很快辞职。见前文注引〔元〕李谦《中书左丞相张文谦神道碑》。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认识到，史彬获得卢世荣的荐举并非偶然。就必要性而言，拉他人伙对于树立并巩固卢氏执政集团的正面形象大有裨益。这不仅因为史彬具有显赫的家世、履历，更是因为史氏家族在汉族士大夫阶层当中具有巨大的人脉和影响，远非一般勋贵家族可比。况且他虽受阿合马牵连，却并非受人痛恨的阿合马死党，被起用不会受到舆论较大的非议。就可能性而言，史彬正处于政治生涯低谷，此时卢世荣施以援手，帮助他东山再起，显然更有可能获得感激和回报。<sup>①</sup>另外曾与阿合马默契共处的经历，也会使得史彬在情感上比较容易认同类似的理财政策，从而成为卢世荣新政的支持者。

卢世荣上台前后企图拉拢援引的人不在少数，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接受邀请。例如他看上了在家“居闲养晦”的畏兀儿僕氏家族成员都尔弥势，“欲引为参知政事”。都尔弥势却认为他“不足与共事”，因而“辞不拜”。<sup>②</sup>有些巧合的是，撰写《哀辞》悼念史彬的王恽也曾受到卢世荣援引。其子王公孺撰写的《神道碑》记载：

（至元）二十二年，奏充中书省左司郎中，屡趣不应。时小臣卢以理财用事。或问其故，曰：“力小任重，剥众利己，未见能久者。可近乎？”既而果败，众服其识先而有守。<sup>③</sup>

王恽被征召的具体时间是至元二十二年正月。正在卫州老家养病的他，“不旬时而被旌招者三”<sup>④</sup>。辞召之后，王恽专门著文进行解释。时卢世荣似尚未垮台，因此文中并未直言辞召原因，先说是“以事不果行”，又泛言“人各有宜，孰不自知，越分而行，有乖无随”，“为可为于可为之时，则从而宁，为不可为于不可为之时，其咎即征”。文章以客主问答的形式，假设一名客人劝主人应召，主人则表示：“今吾子坚欲推挽，扶之使前，是茫洋径涉，趣入于无涯之渊。”<sup>⑤</sup>史载卢世荣柄政后，中书左司郎中周賡“因议事微有可否，世荣诬以沮法，奏令杖一百，然后斩之，于是臣僚震慑，无敢言者”<sup>⑥</sup>。王恽应当就是被召去接替周賡的。他与卢世荣素无交往，

① 在史彬担任御史中丞之时，该职品秩为从三品（以后才累进为正二品，见《元史》卷八六《百官志二》，第2178页）。现在能够出任正二品的中书左丞，在级别上也有明显的提升。

② [元] 欧阳玄：《高昌僕氏家传》。

③ [元] 王公孺：《大元故翰林学士中奉大夫知制造同修国史赠学士承旨资善大夫追封太原郡公谥文定王公神道碑铭并序》，《秋涧先生大全文集》附录。

④ [元] 王恽：《答客问》，《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四五。文前小序云：“至元廿一年春正月，予有中省郎曹之命。”“廿一年”当系“廿二年”刊印致误。《元史》卷一六七《王恽传》谓“二十二年春，以左司郎中召”（第3934页），盖得其实。王恽此前担任山东东西道提刑按察副使，其时“以疾还卫”，亦见《元史》本传，《神道碑》失载。

⑤ [元] 王恽：《答客问》。

⑥ 《元史》卷一六八《陈天祥传》，第3944页。参见同书卷二〇五《卢世荣传》，第4569页。[元] 张养浩《资德大夫中书右丞议枢密院事陈公神道碑铭》则仅载周賡被杖一百，未言其被杀。见《归田类稿》卷七，乾隆五十五年刊本。

其被召或许正出自史彬推荐。果真如此的话，这篇文章即可以看作王恽对史彬的回复。另外，许衡的学生、元朝前期名臣、康里人不忽木（1255—1300）在卢世荣“组阁”之际被任命为参议中书省事，同样称病力辞。<sup>①</sup>上述诸人拒绝与卢世荣合作，显然是对他执政的前景并不看好。卢世荣尽管暂时得到忽必烈信任，但在朝中缺乏靠山，绝大多数蒙古、色目勋贵并不把他放在眼里。况且经过阿合马长期当权，社会上下对“言利”之臣的抵制情绪十分强烈，皇太子真金将卢世荣斥为“国之大蠹”<sup>②</sup>，卢本人也对忽必烈说：“臣之行事，多为人所怨。”<sup>③</sup>在这种情况下，投靠卢世荣无疑要冒巨大的政治风险。那么史彬为什么会同意与其合作呢？从史彬的个人背景、经历来考虑，似乎又不无理由。如前文所述，史彬少年得志，官运亨通，人们普遍期待他实现所谓“黑头事业”，继父亲以后再居宰辅之位，完成“凤凰池，还浴凤”的佳话，而这一进程却因受阿合马牵连免职被打断了。卢世荣的荐举，重新为他提供了圆梦的机会，这样的诱惑使他无法保持像王恽那样的清醒头脑和冷静态度。

卢世荣的理财活动昙花一现即告失败。在这一届中书省成员当中（以至元二十一年十一月上任者为限），右丞相安童主要只是挂名，身为左丞的史彬地位仅次于右丞卢世荣，实属卢氏执政集团的二号人物，因此他所面临的攻讦远非清算阿合马时可比。监察御史陈天祥在弹劾卢世荣时说过这样一段话：

今也丞相以孤忠在上，渠辈以同志合从，中间纵有一二善人，势亦安能与彼相抗？惟以一齐人之语，宁堪众楚人之咻？终恐事效无征，同归不胜其任。<sup>④</sup>

陈天祥首先将身为蒙古勋贵的丞相安童与卢氏执政集团区别开来，其次又暗示卢氏执政集团当中有个别“善人”。我们怀疑这个“善人”是指撒的迷失。卢世荣接受审查后，负责将其口供奏禀忽必烈的官员就包括撒的迷失<sup>⑤</sup>，似乎他较早与卢世荣划清了界限，并参加了对卢的审讯。史彬大概没有得到这样戴罪立功的机会，他显然属于陈天祥所说卢世荣的“同志”。

史彬无疑去世于至元二十二年四月卢世荣倒台之后，但具体时间不详。如王恽所言，他的精神压力可能来自“忧悸”即恐惧。清算阿合马时，阿合马的两名主要助手——中书左丞郝禎和耿仁都受到了严厉惩罚，后者被处死，前者已死而剖棺戮尸。

① [元] 苏天爵编，姚景安点校：《元朝名臣事略》卷四《平章鲁国文贞公》引姚燧撰《神道碑》，第62页。对不忽木的任命是否也出自卢世荣推荐，目前无法确定。

② 《元史》卷一一五《裕宗传》，第2892页。

③ 《元史》卷二〇五《卢世荣传》，第4566页。

④ [元] 陈天祥：《论卢世荣奸邪状》。

⑤ 《元史》卷一三《世祖纪十》至元二十二年四月壬戌，第276页。亦见同书卷二〇五《卢世荣传》，第4569页。



这不过是三年前的事。卢世荣在关押半年后也遭到诛杀，甚至还被“剖其肉以食禽獾”<sup>①</sup>。如果这时史彬仍然活着，恐惧情绪更会增加。不过，即使抛开恐惧情绪不谈，仅仅“伊郁而自沮”的挫折感，大概就足以摧垮史彬的意志。史彬加入卢氏执政集团时一定经历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此举很难为舆论所理解<sup>②</sup>，还可能影响到与亲友的关系<sup>③</sup>，对他来说是一场人生的赌博。赌博迅速惨败，应当大大出乎他的意料。对于从小锦衣玉食、人生大部分时间一帆风顺的史彬来说，这个打击超出了他的心理承受能力。一颗曾被寄以厚望的政坛新星就这样陨落了。在当时特殊的环境下，他的丧事一定是低调进行的<sup>④</sup>，因此也未见留下行状碑铭等传记文字。

实际上，元廷对卢世荣同党处置的力度要明显低于阿合马同党。卢世荣撤职后，忽必烈下令：“安童与诸老臣议世荣所行，当罢者罢之，更者更之。其所用人实无罪者，朕自裁决。”<sup>⑤</sup>一开始就肯定卢世荣所用之人当中有“实无罪者”。卢世荣虽然被杀，但卢氏执政集团的其他要员并未受到严惩，有的后来仍然官居要职。例如与史彬同时被卢世荣荐用的参知政事不鲁迷失海牙（廉希恕），几年后又在江淮和湖广行省担任参知政事、右丞等职务，在湖广并兼任行海北海南道宣慰使都元帅，卒封齐国公。<sup>⑥</sup>又如曾被卢世荣荐为浙西道宣慰使的王好礼<sup>⑦</sup>，在卢氏倒台后仍然担任平江路总管，至元二十五年调任河南河北道提刑按察使<sup>⑧</sup>，成宗时官居参知政事<sup>⑨</sup>。这种情

① 《元史》卷二〇五《卢世荣传》，第4570页。

② 例如前引王恽《左丞史公哀辞》有“辨奸听彻唐君说”之句，似乎就是在批评史彬缺乏判断力，没有看出卢世荣是个“奸臣”。这个典故出自唐朝。唐德宗时宰相卢杞以奸邪著称，德宗却对大臣李泌说：“卢杞忠清强介，人言杞奸邪，朕殊不觉其然。”李泌回答：“人言杞奸邪，而陛下独不觉其奸邪，此乃杞之所以为奸邪也！”见《资治通鉴》卷二三三《唐纪四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点校本，第7511页。

③ 史彬是董文忠之婿，而董文忠之兄、时任翰林学士的董文用就持反对卢世荣的立场，曾与卢当众辩论，被誉为“以一言折聚敛之臣”。见〔元〕虞集《翰林学士承旨董公行状》，《道园学古录》卷二〇。

④ 王恽《哀辞》谓“左丞史公之薨，客有云云者”。似乎当时有人在史彬去世后还对他进行非议。

⑤ 《元史》卷一三《世祖纪十》至元二十二年四月壬戌，第276页。亦见同书卷二〇五《卢世荣传》，第4570页。

⑥ 参见《元史》卷一五《世祖纪十二》至元二十六年正月丙戌，第318页；卷一六《世祖纪十三》至元二十八年五月戊戌，第346页；〔元〕黄溍《魏郡夫人伟吾氏墓志铭》，《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三九；〔元〕胡助《廉侯遗爱传》，《纯白斋类稿》卷一八，《丛书集成初编》本。

⑦ 王好礼，真定人，中统元年（1260）曾任中书省宣使。父王晋（一作王缙）为史氏藩府幕僚，元初曾任中书参知政事，因事获罪被杀。岳父李伯祐为史氏部将，官至侍卫亲军都指挥使。见〔元〕王恽《中堂事记上》，《秋润先生大全文集》卷八〇；〔元〕姚燧《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李公神道碑》，《牧庵集》卷一九，《四部丛刊》本。其被卢世荣推荐事，见《元史》卷二〇五《卢世荣传》，第4568页。从与史氏家族的密切关系来看，他得到卢世荣推荐或许与史彬有关。

⑧ 〔明〕王鏊等纂：《正德姑苏志》卷三《古今守令表中》，上海书店影印《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本。

⑨ 〔元〕姚燧：《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李公神道碑》，《牧庵集》卷一九。该碑撰写于成宗时，其中称王好礼为“今参知政事”。按《元史·宰相年表》不见王好礼之名，他担任的有可能是行省参知政事。

况可能与卢世荣柄政时间过短、其集团成员的积怨尚不严重有关。不管怎样，大体可以推断，如果史彬没有去世，也未必会受到很重的处分，将来应当还有重新起用的机会。王恽在《左丞史公哀辞》中正是从这个角度表达了强烈的惋惜心情。在王恽看来，史彬出任中书左丞虽然在“所受之正”方面有缺憾，但其主要动机仍然“不违于义”。因此面临挫败时尽管“理有难处”，也还是需要“少隐忍以光先正之业”，不应该“无定力以顺受”，背上一时的个人荣辱包袱不能自拔。考虑到史彬死时最多只有46岁<sup>①</sup>，不能不认为王恽的感慨很有道理。他本来是可以不被历史所遗忘的。

附带谈一个小问题。《左丞史公哀辞》中“当克明之无定力以顺受”一句，似乎有些难解<sup>②</sup>，假如不将“当克明之”四字上属的话<sup>③</sup>，就只有将“克明”理解为人名才能读通。我们知道史彬有好几位兄长的表字中都带有“明”字，包括其长兄史格字晋明，四兄史杠字柔明，堂兄史枢字子明。<sup>④</sup>因此“克明”有可能就是史彬的表字。

#### 四 家人与轶事

在史彬的家人当中，父亲史天泽和诸位兄长是研究者比较熟悉的，此处不再赘言，只谈谈其他的家人。

史彬的生母是谁，史料乏载，只能进行一些推测。《史天泽神道碑》记载他共有四位夫人，依次是石氏、李氏、纳合氏、抹撚氏。但撰写于1240年的崔铉《史氏庆源之碑》所载史天泽夫人却只有自李氏以下三位，并无石氏。这表明石夫人系史天泽此后新娶，而且地位重要，后来居上。<sup>⑤</sup>如前文所述，《史氏庆源之碑》树立时史天泽的后三子尚未出生，包括史彬在内。这样，史彬就有可能是石夫人所生。关于石夫人的身份，孙楷第先生曾怀疑她出自金蒙之际汉族军阀北京石氏家族<sup>⑥</sup>，很有道理。北京石氏的核心人物石天应（？—1222），成吉思汗十年（1215）以兴中府（今辽宁朝阳）投降蒙古大将木华黎，授兴中府尹、兵马都提控，后随蒙古军南征，擢陕西河东路行台兵马都元帅，战死。其子侄大都官于兴中府，子焕中任知兴中府事，受中任兴中府相副官，侄佐中任兴中府千户。<sup>⑦</sup>兴中府在金朝隶属于北京路

① 以其出生于庚子年（窝阔台十二年，1240）年底，卒于至元二十二年底或二十三年初推算。

②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秋涧集》本句作“当仓卒之会无定力以顺受”，不知所据，疑系妄改。

③ 如以此四字上属，则当与上句连读为：“其宠辱有不足惊者，当克明之。”感觉也不尽通顺。

④ 见《史格神道碑》，《史杠墓志》，《史枢神道碑》。

⑤ 史英豪《真定史氏族谱和历史的考证》一文已经揭示出这一问题。见“史氏春秋网”<http://www.sscqw.org/Article/zhending/200904/280.html>。

⑥ 孙楷第：《元曲家考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38页。

⑦ 《元史》卷一四九《石天应传》，第3528页。

(治今内蒙古宁城西)，而北京路恰好是“史氏发迹之地”<sup>①</sup>。木华黎进攻并招降北京时，史氏家族成员皆参与其役。天泽之父史秉直随后授北京路行六部尚书，主管军府后勤等事务，“盖首尾二十年”。叔父史进道授义州节度使、行北京路兵马都元帅，“治北京十有余年”<sup>②</sup>。史、石两家在这段时间互相交往，缔结姻缘，是很自然的。石氏家族在蒙金战争时期作为一支地方势力，地位与史氏接近，石天应更是早期降蒙军阀当中的重要人物。相比之下，史天泽早年三位夫人当中排在前面的李夫人，有可能出自李伯祐家族<sup>③</sup>，伯祐则仅系史氏部将。这似乎可以解释石夫人后来居上的原因。进一步推论，史彬在诸兄弟中年龄最小，仕途却最为显达，或许也有“子以母贵”的因素。

史彬娶董文忠长女为妻。姚燧《牧庵集》卷一五《董文忠神道碑》：“女三人，长适太尉子中书左丞彬。”该碑也收录在《国朝文类》卷六一，题为《金书枢密院事董公神道碑》，本句作：“女三人，长适中书左丞史彬。”脱“太尉子”三字而增“史”字。<sup>④</sup>董文忠（1231—1281）出自蒙元另一家汉人世家藁城董氏。藁城董氏早期的地位不及史氏，但在董文忠这一代，凭借忽必烈潜邸侍臣的身份一跃成为与史氏并列的显贵家族<sup>⑤</sup>，直到元朝后期，董氏成员始终“为列圣信用，亲切不异于国人，任使无间于台省”<sup>⑥</sup>。董文忠长期供职怯薛，“于诛赏大政，往往预闻”，“能于大事多所建明”<sup>⑦</sup>，是忽必烈非常信任的近臣。与他结婚对于史彬在仕途上的发展大有帮助。据前引刘敏中《代史中丞路祭故副枢董公文》，董文忠对这位乘龙快婿十分关心，“始之未立，忧其弗充，既立而成，勉其所终”。如果不是过早去世，他应当会在史彬身陷困境时予以帮助，那样史彬或许就不会抑郁忧惧而死了。

就目前所知，史彬至少有一个儿子，名为史燮。史燮复娶董文忠孙女为妻。《董文忠神道碑》：“女孙六人，长由其姑归史氏，故又适左丞子某。”“其姑”指董文忠之女、史彬之妻，“左丞”即史彬。《金书枢密院事董公神道碑》则载：“女孙六人，

① 孙楷第先生语。见《元曲家考略》，第138页。

② [元]刘祁：《本朝故北京路行六部尚书史公神道碑铭并序》；[元]段绍先：《义州节度使行北京路兵马都元帅史公神道之碑》。均见《永清文征》卷二。

③ 参见[元]姚燧《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李公神道碑》。

④ 董文忠神道碑在《牧庵集》和《国朝文类》中的这两个版本，内容略有差异。经比较大致可以判断，《牧庵集》所收系姚燧原稿，《国朝文类》所收则在前者基础上有所删润，同时更新了有关董文忠子孙的记载。参见下文。

⑤ 由元人元明善撰写于成宗朝的《藁城董氏家传》在概括诸家世侯地位时说：“史太尉有助王室，为诸氏冠。藁城董氏能与之班，而又以孝义称，今遂大显。”见《国朝文类》卷七〇。萧启庆先生经过统计个案资料总结指出：“董氏登仕人数略少于史氏，但其家族与汗廷关系之密切，官位之崇高，及仕宦之持久，较之史氏有过之而无不及。”见萧氏《元代几个汉军世家的仕宦与婚姻》。

⑥ [元]虞集：《江西省参政董公神道碑》，《道园类稿》卷四三，台湾《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影印明初覆刊本。

⑦ [元]苏天爵编，姚景安点校：《元朝名臣事略》卷一四《枢密董正献公》引卢挚撰《墓志》，第291页。

长适左藏库大使史燮”。两相参照，可知史燮为史彬之子，并且大约就是董夫人所生。董文忠这位孙女是其长子董士珍（1256—1314）的长女。士珍神道碑载：“女三人，长适镇阳王孙正议大夫、兴国路总管史燮。”<sup>①</sup>董士珍出身于皇太子真金怯薛，曾受学于名儒许衡，元朝中期历任中书参知政事、御史中丞。以其生年推算，史彬去世时他只有三十岁，则其女与史燮成婚更有可能是史彬身后。如上文注释所言，《牧庵集》所收《董文忠神道碑》系作者姚燧的原稿，其定稿时间应在成宗大德七年（1303）到八年。<sup>②</sup>其中称史燮为“左丞子某”，不书官位，可知此时史燮虽已成婚，尚未入仕。而《金书枢密院事董公神道碑》是一个经过修改的版本，改动时间约在大德十一年（1307）到武宗至大元年（1308）之间。<sup>③</sup>此时史燮已担任左藏库大使，估计这是他的初任职务。左藏库为太府监下辖内府三库之一，“掌收支常课和买纱、罗、布、绢、丝绵、绒锦、木绵、铺陈衣服诸物”，其大使正六品。<sup>④</sup>虽系钱谷之职，但初仕即为正六品官，仍非常人所及，还是得益于家族的“根脚”。至于董士珍的神道碑，据碑文交待，是在顺帝至正四年（1344）十二月奉旨撰写的。此时距史彬之死已近六十年，史燮即使在世，年龄也当逾古稀，因此该碑所记史燮的“兴国路总管”一职，似乎是他的终任职务。然方志又载史燮曾任澧州路总管。<sup>⑤</sup>澧州为上路，兴国为下路<sup>⑥</sup>，正常情况下史燮应该先任兴国，再任澧州。其间详情，史料乏载，只能暂时存疑。

王恽还写过一篇《软背椅赞》<sup>⑦</sup>，其中曾经提到史彬之子。文章描述了一种以绳网制作靠背、带有扶手的软椅，序称“故左丞史公之子假予是具，其安四体养老妙意，有不可胜言者”。从文中大赞这把软椅的“养老”功能来看，应当是在他晚年所写，亦可见王恽与史彬的友情影响到了下一代。这位“故左丞史公之子”，或许就是史燮。

① [元] 欧阳玄：《大元敕赐故资政大夫御史中丞赠纯诚肃政功臣开府仪同三司太傅上柱国赵国公溢清献董公神道之碑》，[清] 沈涛纂：《常山贞石志》卷二三，清道光二十二年刻本。

② 据姚燧在碑中交待，大德五年元廷为董文忠追加封谥后，其子董士珍“将铭坟道”，因而持王思廉所撰行状“远走江东”拜访正在担任江东建康道肃政廉访使的姚燧，请他撰写碑文。《牧庵集》附录刘致所撰姚燧《年谱》即将董士珍求撰碑文的时间系于大德五年，则这篇神道碑当完成于此后不久。然碑文中提到董士珍的身份为“中书省参知政事”，而据《元史》本纪（第448页）及宰相年表（第2809—2810页），董士珍任中书参政系大德七年二月任命，四月上任，八年正月去职。如此，该碑的定稿时间只能是大德七年到八年。

③ 这个时间是参照董文忠幼子董士恭的履历推算的。该碑提到士恭的官衔为“正议大夫、典瑞太监”，而据[元] 黄潜《资德大夫陕西诸道行御史台御史中丞董公神道碑》（《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二六），董士恭授此官衔即在大德十一年，到至大元年，已进为中奉大夫、同知典瑞院事。

④ 《元史》卷九〇《百官志六》，第2292页。

⑤ [明] 钟崇文纂《隆庆岳州府志》卷一三《宦绩列传·澧州》：“史燮，真定人，由世勋为路总管，以慈惠明慎称。”上海古籍书店影印《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本。同书卷三《秩官年表上》亦有史燮之名，然均未载其任官时间。王德毅等编《元人传记资料索引》（第233页）及萧启庆前揭《元代几个汉军世家的仕宦与婚姻》一文均将史燮职务误记为岳州路总管。

⑥ 见《元史》卷六三《地理志五》，第1525、1526页。

⑦ 《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六六。

史彬家人情况可考者大体如上。关于其本人，文献中还存有一则轶事，在此一并述及。元人夏庭芝《青楼集》“张怡云”条：

张怡云，能诗词，善谈笑，艺绝流辈，名重京师……姚牧庵、阎静轩每于其家小酌。一日，过钟楼街，遇史中丞。中丞下道笑而问曰：“二先生所往，可容侍行否？”姚云：“中丞上马。”史于是屏驺从，速其归携酒馔，因与造海子上之居。姚与阎呼曰：“怡云，今日有佳客，此乃中丞史公子也。我辈当为尔作主人。”张便取酒，先寿史，且歌“云间贵公子，玉骨秀横秋”《水调歌》一阙，史甚喜。有顷，酒馔至，史取银二定酬歌。席终，左右欲撤酒器，皆金玉者。史云：“休将去，留待二先生来此受用。”其赏音有如此者。

《青楼集》是一部记述元代戏曲演员事迹的著作，成书于元末。这条有关女伶张怡云的记载提到了几位重要人物，其中姚牧庵、阎静轩分别是元朝前期著名文士姚燧和阎复，“史中丞”显然就是史彬。<sup>①</sup>本则轶事除反映史彬生活豪奢及其与文士的交谊外，也表明他是一个“赏音”即通晓音律的人。比《青楼集》成书稍早的钟嗣成《录鬼簿》，在开列“前辈已死名公有乐府行于世者”名单时列入了“史中丞”<sup>②</sup>，可以为证。据此史彬还是散曲作家，可惜现在已经看不到他的作品。不过，他的手迹似乎尚有留存。河北石家庄西南的封龙山上矗立着一块巨石，上书“试剑石”三大字，传说即系史彬手书。<sup>③</sup>综合上述零散材料来看，史彬尽管出身将门，但却较具文人气质。这种情况当非偶然。史天泽很注意对下一代的教育<sup>④</sup>，真定史氏幕府中又延揽过许多名士，因此天泽诸子中颇有以文艺知名者。如其次子史樟“喜庄、列学，以散仙自号”<sup>⑤</sup>，并被《录鬼簿》列于“前辈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编传奇行于世者”名单之

① 《青楼集》传世版本不一，以上引文系据孙崇涛、徐宏图《青楼集笺注》所用《双梅景阁丛书》本，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其中“此中丞史公子也”一句，在《青楼集》另外两种重要版本明抄《说集》本和清赵魏抄校本中，均作“此中丞八公子也”，或更为准确。《青楼集笺注》已指出此人即系史天泽第八子史彬。见该书第64—71页。

② 《录鬼簿》的传世版本也十分复杂，有学者将其分为简本、繁本、增补本三个系统。开列“史中丞”者为简、繁二本，这两个系统的版本最早皆成书于元朝后期。增补本则是在明初贾仲明增补之后形成的，其中“史中丞”作“史中书丞相天泽”，当系不知“史中丞”为何人而妄改。见王钢《校订录鬼簿三种》，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5、57、129页。

③ [明]李贤等纂《大明一统志》（三秦出版社影印明天顺刊本）卷三《真定府·山川》“试剑石”条：“在元氏县封龙山上。唐郭元振游学于此山，见一石中裂出五色云气，因得石中宝剑。左丞史彬书‘试剑石’三字于上。”按郭元振系唐朝前期名臣，有七言古诗《古剑歌》传世（见[唐]张说《兵部尚书代国公赠少保郭公行状》，《文苑英华》卷九七二，中华书局影印本），所谓石中得剑的传说可能是由此衍生出来的。这块石头和上面的三个大字现在仍被称为“元氏八景”之一（当地属元氏县）。相关照片参见史氏春秋网 <http://www.ssqw.org/Article/zhending/200904/283.html>。

④ 《史天泽家传》称赞其“训教子侄，又有大过人者”。

⑤ [元]王恽：《九公子画像赞》，《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六六。史樟为史天泽次子，史料或称之为“九公子”、“九万户”，其行第系包括同祖从兄弟而言。

中，有杂剧《花间四友庄周梦》传世。<sup>①</sup>四子史杠工于绘画，“作人物、山水、花竹翎毛，咸精到”<sup>②</sup>。史彬的情况，大概也相类似。

## 五 余论：两个史彬？

最后还有一个与史彬有关的疑难问题，暂时无法解决，只能录以待考。这个问题就是，在真定史氏家族中竟然有两位名叫史彬的成员。另一位史彬的父亲史天祥（1191—1258），与史天泽为同高祖的族兄弟，官至海滨和众、利州等处总管，兼领霸州御衣局人匠都达鲁花赤，行北京七路兵马都元帅府事，《元史》卷一四七有传。传末云：

子彬，江东提刑按察副使；槐，袭霸州御衣局人匠都达鲁花赤。<sup>③</sup>

据此，史天祥的长子亦名史彬。两个史彬作为族兄弟已系五服之外，血缘关系疏远，但按理说仍不应该同名。这一情况给学者带来很大困惑。萧启庆先生指出“其中尚有待发之覆”，在具体论述中则似乎倾向于史彬系史天祥子而非天泽子，例如说“董文忠长女嫁与史天祥长子中书左丞史彬”。<sup>④</sup>《蒙兀儿史记》、《新元史》干脆将史天泽第八子史彬的名字改为史构。<sup>⑤</sup>对于两个史彬的疑问，从逻辑上可以作出两种推测，不过似乎都未必成立。

第一种推测，是两个史彬实为一人，因过继导致身份重叠。过继的情况在史氏家族中确实存在，史权（史天倪之子、史楫之弟）的长子史耀就过继给了史格。<sup>⑥</sup>然而，史格过继史耀是因为自己无子（过继之后才又生了儿子史荣），史天祥、史天泽的情况不同。在1240年，史天祥已经有了三个年幼的儿子<sup>⑦</sup>，只有三子皆早死，才会过继后来出生的史天泽第八子，这种概率甚小。同样，史天泽在有了七个儿子的情况下，更没有必要过继第八个儿子。将史彬合二为一的推测不易成立，还有一个原

① 见王钢《校订录鬼簿三种》第12、72、150页。参见〔日〕吉川幸次郎著，郑清茂译《元杂剧研究》，台北，艺文印书馆，1987年，第90—93页。

② 〔元〕夏文彦：《图绘宝鉴》卷五《元》，《丛书集成初编》本。

③ 《元史》，第3489页。按该传称史天祥之父史怀德为天泽父史秉直之弟，如此则天祥、天泽为从兄弟，不确。兹据〔元〕崔铉《史氏庆源之碑》改正。

④ 萧启庆：《元代几个汉军世家的仕宦与婚姻》。按萧先生误以董文忠之长婿为史天祥子，一部分原因是由于他只注意到《金书枢密院事董公神道碑》“女三人，长适中书左丞史彬”的记载，未曾注意“中书左丞史彬”在《牧庵集·董文忠神道碑》这一版本中作“太尉子中书左丞彬”。

⑤ 见〔清〕屠寄《蒙兀儿史记》卷七八《史天泽传》、〔民国〕柯劭忞《新元史》卷一三八《史天泽传》。这一改动应当是《蒙兀儿史记》首先作出的，《新元史》沿袭其说。然实不知其有何凭据，恐怕只能视为妄改。

⑥ 见〔元〕姚燧《荣禄大夫福建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大司农史公神道碑》，《牧庵集》卷一六。

⑦ 见〔元〕崔铉《史氏庆源之碑》。碑中记载了史天祥三个儿子的乳名，但文字有缺损，只能读出长子名为镇口，三子名为兴驴，次子之名磨灭无法辨识。

因，就是史天泽之子史彬的“江东提刑按察副使”官衔很难嵌入到史天泽之子史彬的经历当中。江东提刑按察副使是江东建康道提刑按察司的副长官，秩正四品。该按察司是至元十四年七月设立的<sup>①</sup>，此时史天泽之子史彬已经担任御史中丞。假定他任中丞不久，即贬秩为江东提刑按察副使，后来再重新回到中丞岗位，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然终嫌迂远，史料中也没有旁证。

第二种推测，则是《元史·史天祥传》所载其长子之名不确。除该传外，目前尚未找到其他任何一条确实属于史天祥长子史彬的材料。或许史天祥的长子本来就不叫史彬，《元史》记载有误。然而，这也仅是假设而已，同样缺乏坚实的证据。

另外需要补充的是，史氏家族成员还有其他重名之例。史楫有二十一个儿子，其中第三子名史燁，第二十子名史烜。<sup>②</sup>与此同时，史枢亦有一子名史燁<sup>③</sup>，史权亦有一子名史烜<sup>④</sup>。两个史燁是同曾祖的再从兄弟，两个史烜甚至是同祖从兄弟，其血缘关系比两个史彬更近，同名现象更加难以理解。如果说他们也都是因过继造成身份重叠，或均为史料记载人名有误，似乎不尽合乎情理。总之，包括两个史彬在内的史氏家族成员重名现象，在发现新的材料之前，暂时还无法给出解释。但无论如何，都不影响本文对史天泽第八子史彬的研究结论：他是确有其人的，而且担任过御史中丞、中书左丞的要职，只是不幸被历史遗忘了而已。

[作者毛海明，1974年生，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张帆，1967年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收稿日期：2012年3月6日

- 
- ① [元]刘孟琛等纂，王晓欣点校：《南台备要》“立江南提刑按察司条画”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与《宪台通纪》合刊），2002年，第154页。
- ② [元]王恽：《大元故真定路兵马都总管史公神道碑》，《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五四。碑载史燁官衔为“奉训大夫、孟州知州”（指至元十八年撰碑之时。当时登门请求王恽撰写本篇碑文的就是史燁），不载史烜官衔，似尚未出仕。
- ③ 《元史》卷一四七《史枢传》（第3485页）载其二子姓名、官衔，其中第二子为“燁，奉训大夫、秘书少监”。[元]王士点、商企翁编，高荣盛点校《秘书监志》卷九《题名》“秘书少监”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70页）：“史燁，至元二十八年十二月初九日以奉训大夫上。”可以为证。据《史氏残谱》所载《史枢神道碑》，史枢至少有五子，然相关部分文字残缺，未见史燁之名。
- ④ [元]邓文原《故朝散大夫同知饶州路总管府事史公墓铭》是史权之孙史元亨的墓志铭，其中明确记载元亨之父名烜，是史权之子，官至“太中大夫、同知两淮都转运司事”。见《巴西邓先生文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清抄本。碑文载史权共有六子，然大都未著其名。如我们所知，史权的长子史燁过继给了史裕，则史烜似为史权次子。